

难忘的会见

廖其康

1937年1月至1939年12月，我在敬爱的周副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工作。他对我的谆谆教诲和亲切关怀，以及他一切为了中国革命，心中只有同志，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崇高品德令我永世难忘。

1939年，组织上派我到福建，将一捆《新华日报》送到龙岩附近白沙镇的一家杂货店，然后转给当地的游击队和地下党。回来时经过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同志找我谈话，告诉我周副主席因为手摔坏了，已经出国治疗，要我先回延安中央组织部。我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一边学文化，一边等周副主席回来。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没有等到周副主席回来，我就调到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当敌工科科长去了。

（一）

1953年，我在西南局公安部任科长，分管外国侨民工作。

这年夏天，我到北京参加外交部的侨务工作会议。从1939年我离开周副主席后，一别十四年了，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周副主席和邓大姐。这次来到北京，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见到他们。于是我就给在中南海教导队的张跃词同志打电话，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愿望。他转达了我的请求，周总理让张跃词同志用车把我接到中南海他家里。

总理穿着整洁的中山服，一见面头一句话就关切地问：
“现在你认识多少字啦？”

我回答：“我可以看报纸了。”

总理又问：“报上的字你都认识吗？”

“有个别的字不认识。有的认识，写不出来。”

总理又问起我的工作情况：“你在西南局作什么工作？”

我回答：“当科长。”

总理问道：“当什么科长？”

我说：“在西南公安部一处侦察科当科长。”

总理“哦”了一声。“你这科有多少人？”他问我。

我回答道：“有40多人。”

总理又问：“你这个科有大学生吗？”

“有，大学生占一半多，至少都是高中生、初中生。”

听到这里，总理饶有兴趣地象考我似地问道：“你怎么领导得了呢？”

于是，我就比较详细地汇报了我的工作方法：“我向他們学习文化知识，他们是我的老师。我的工作经验比他们多一点，在写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时，就召开科务会。我在会上讲我的意见、办法，找个秘书给我记录，这样我讲他记，完了以后他整理出来给我看。我看了以后，如果和我讲的一样，我就签字报上去，上级批准了，我就照计划办。”

总理听了我的汇报，仰着头笑起来：“你还有点办法嘛！”想起当年总理教我认字、写字，我不好意思地说：

“我有什么办法，我这办法还不是你教的！”

总理又笑了起来，笑容是那么亲切。他说：“你这话不全

对，应该说是党教的，是党的培养，包括我在内，也是党的培养。”望着总理，我心理又激动又惭愧。

接着总理又问：“你参加学习没有？”

我说：“参加了。”

总理问：“学什么？”

“公安部组织的中级组。”

总理又问：“中级组学什么？”

“学《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胡乔木同志编写的。”

总理还问我：“你们部长是周兴吗？”

“是的。”我当年在总理身边，就是到西北保卫局周兴同志那里报的到。

“周兴同志还是你的老首长啊。”

我答道：“是啊！”

这时总理注视着我，对我说：“你回去告诉周兴同志，象你这样的干部，在旧社会从小就参加了红军，又没有进过学堂门，没有读过书，最好不要先学理论，要扫盲，先学文化。文化是革命的工具，没有文化，好多字你都不认识，你怎么学得懂理论呢？你怎么知道马克思主义呢？你给周兴同志说，这是我的意见。”我又兴奋又感动，连连点头。

回到西南公安部，我立刻给周兴部长汇报了工作，谈了总理给我说的这些话，他一听，就笑着说：“那你的意思是要去学习文化罗！”

不久组织上安排我到省党校文化部去学了一年半的文化。当时的省党校文化部在沙坪坝区小龙坎，现在的地质探矿厂内。

在省党校文化部，我刻苦学习，一年半的时间，我新认

识了1200个字；学了语法，懂得写文章要会用词、造句。同时由于总理的亲切教导和自己在工作中的体会，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干革命需要掌握文化知识。

(二)

1958年，这时我已在重庆一〇二钢厂任人事厂长。这年冬天，冶金部召开人事工作会议，我第二次来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给张跃词同志打电话，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问我：“想不想看看总理呀，看看大姐呀？”“这还用得着说吗？”我说，“想呀，怎么不想呢？”他记下我的电话号码，很快就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晚上十一点钟有车来接我。十一点钟一名警卫来到我住的房间，我随他乘车由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来到总理家。

这时总理正在客厅和几个专家研究计划生育的问题，邓大姐热情地迎了上来。她穿着还是那么朴素，见到我亲切地说：“你还是那个样子。”我握着大姐的手，心里涌上了一股暖流。

等了很久，总理还在同几位专家研究工作，大姐进去看了三次，直到十二点过了，总理他们的会议才结束。这时晚饭已经摆好了。一张方桌，总理坐一方，我、大姐各坐一方。桌上有四样菜，因为天冷，三个盘子都加了盖，还有一个汤碗也加了盖。大家坐下后，大姐把头一个盘子揭开，是一份红烧肉。大姐指着那个盘子对我说：“这个菜是给你作的。”她又揭开第二个盘子，是普通的烧豆腐，揭开第三个盘子是炒豆芽，然后打开汤碗的盖，是一碗鸡蛋菠菜汤。我一看，不知怎么的，喉咙发哽，眼泪就流出来了。

大姐见我这样，就连声说：“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多吃点，你这么瘦。”可我怎么吃得下呢？总理呀总理，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你吃白菜豆腐、炒豆芽，和大家一起吃大灶，那时你说，不要忘记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在延安吃黑豆、吃山药蛋，连小米也吃不上。你说，毛主席的窗子还是麻纸糊的呢。我们在国统区吃的比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吃得好得多，有大米饭，要象方志敏同志那样，节约每一个铜板为革命。现在你是国家的总理，日理万机，可你，还是这样……你的身体怎么支持得了啊！

晚饭后，已是夜里一点多钟，总理还要去审查剧本《兵临城下》。大姐让我同总理乘车一起去，临上车前，大姐嘱咐我说：“到了怀仁堂以后，总理跟你说话，你就跟他说话，总理不问你，你就别问他。”我知道，总理已经很疲劳了，我象当年接受任务一样响亮地答道：“是！我知道。”大姐笑起来，“你还是那样！”

我们从怀仁堂出来时，总理见我去的时候穿着大衣，走出礼堂没穿大衣，便问我：“你的大衣呢？”我说：“挂在外面衣帽间。”我拿了大衣，总理叫司机把我送到华侨饭店。一路上我的心里很不平静，革命胜利多年了，总理还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仍然随时都关怀着部下。

（三）

1964年，周总理出国访问后回到成都，住在金牛坝招待所，当时我正在成都学习。一天，童小鹏同志打电话给赵继同志（他们都是当年南方局的），叫他转告我，要我们到金牛坝去。一个下午，我和赵继同志乘车来到金牛坝招待所。

在童小鹏同志住的小楼吃了晚饭后，由他领着我和赵继同志来到总理住的地方。只见总理正和陈毅同志、李井泉同志在走廊上谈话。我是第一次见到陈毅同志，我和赵继同志站在旁边。李井泉同志正在汇报四川的情况，只听见周总理说：

“四川的粮食外调的多了一点吧？”我和赵继同志要离开，总理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先到礼堂去，等着看戏。”我们先到了礼堂，戏开演前周总理、陈毅、李井泉等同志也来了。演的是川剧折子戏，很精彩。戏演完了以后，总理亲自叫警卫员用车把我和赵继同志送回去。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总理。

1976年1月9日，声声哀乐传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举国上下哀恸撼地。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眼泪都哭干了。如果能够代替，我情愿代替总理下黄泉。总理啊！回想您手把手教我写字，整整三年我跟着您从西安到太原，从武汉到重庆，三次回延安，亲眼见到您为中国革命是怎样地出生入死，呕心沥血；亲身感受到您的诚挚关怀和亲切教诲。您的伟大人格和崇高品德，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钟 华记录整理）

在周副主席的亲切教导下

张 兴 富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十二个年头了。每当我回忆起四十多年前在沙磁区工作时，多次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心中总是充满着无限的怀念之情。他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形象，如巍巍红岩，永存人间。

周副主席与中国青年科技协会

中国青年科技协会（简称“青科技”），是1939年在沙磁区成立的一个科技界的群众团体。它以联谊会的形式出现，通过科技学术交流，广泛团结青年科技工作者，学习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939年我在重庆大学冶金系毕业后，考入国民党兵工署二十四厂（现重庆特殊钢厂）任技术员，在厂内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团结了二十多位青年科技人员，组织了“工程技术人员学习会”，并以学习会为基础，进一步联系了沙磁区一大批进步青年科技人员开展活动。党的南方局非常重视青年科技读书会的进步活动。周副主席在听取了我的汇报后，支持我们正式成立“中国青年科技协会”。1940年5月，我向树人中学校长傅世珩（地下党员）商借该校的一间大教室，召开了成立大会。“青科技”正式成立后，在周副主席的指示下，徐冰同志通知我和协会负责人周建南等几位中共党员到曾家岩50号城内办事处，开了一个小型

• 7 •

座谈会。周副主席当天有公务，委托董必武、叶剑英和李强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延安生产情况和延安所需要的科技人才和资料。会上布置了为延安物色和输送科技人才及搜集延安所需要的科技资料的任务。会后，我们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以沙磁区工厂企业和科研单位为基地（我们的会员以重庆大学、二十四兵工厂及各分厂、二十五厂为主，包括化龙桥资源委员会三个厂，歌乐山的药专等十多个厂校科研部门），进一步发展到成都、遵义和昆明等地区。调查研究国统区的工业和科技情况，搜集了不少科技资料送到红岩村。为了向延安输送科技人才和提供技术资料，遵照南方局徐冰同志的指示，在磁器口恒大饭店开会，商议兴办企业，为党的秘密工作服务，安排地下党员和一批青年科技人员，在南方局的资助下，我们先后在重庆开办了“巴克新建筑公司”，委托磁器口药专制药厂培训制药技术人员，在江北统井办了“川东企业公司”，在通江办了“巴山石墨制品公司”，储备和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有的后来输送到延安。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青科技”加强对上层人士的联系，我们联系了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上川实业公司总经理章乃器、永利化学公司经理范洪畴和兵工厂厂长李丞干等一大批社会名流，专家学者支持我们的活动，在上层人士中扩大党的影响。还为南方局提供了无线电器材，为延安输送了炼钢技术工人顾林和几名制药技术人员。

周副主席派我去戴市场开辟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党的南方局在周副主席的领导下，曾作过应变的计划，考虑

如来不及撤退，先把机关人员和地下党员疏散到一个安全地方。党了解到广安县有个老同盟会员、在川军熊克武部下当过师长的郑启和，当时正在广安戴市场和华蓥山一带经营实业，兴办造纸厂、硫磺厂和煤矿，还掌握有一支武装力量，在当地很有实力，在军政界上层中有影响，因此打算利用郑启和的地盘作为疏散我们人员的一个安全地点。党组织了解到郑启和与重庆大学著名教授何鲁以及杨森的秘书长聂丕承有深交，而何鲁与我有师生之谊，我们重庆大学支部的聂士懋同志则是聂丕承的儿子，通过我俩的关系可以取得郑启和的信任。

1941年秋的一天，党组织通知我到南方局，周副主席亲自接见我，决定派我去广安开辟工作。周副主席听了我的汇报有关郑启和的关系后，高兴地说：“好，先去那里看看，想法在那里立住脚。”并对如何开辟工作作了指示。

我在广安戴市场了解到：郑启和是川军的老军人，在川军中有威望，原在熊克武部下当师长，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到广州时，受蒋介石的排挤，缴了他们的枪。郑一贯反蒋，有民主革命思想，一度在上海当寓公，后回广安老家经营企业并组建一支武装，有五千多支枪。靠他在军政界的老关系和威望，联络当地开明士绅将这块地盘治理成一个“世外桃源”，他招揽人才办企业，办军械厂，俨然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从广安回来后，我立即到南方局向周副主席作了详细汇报，还有邓颖超同志和徐冰等十多位同志一起听了我的汇报。周副主席指示说：“不要暴露党员身份，搞好争取团结工作，尽力帮助他（指郑启和）。”会后，我的组织关系从

沙磁区转到南方局，经周副主席指示由徐冰同志直接领导。我与“青科技”的邓毅、李斌之、江济业和我爱人刘为端以工程师的名义，通过杨森秘书长聂丕承的介绍在郑启和的地盘立住了脚。我们尽力帮助他改进了造纸和军械技术，协助他设计修建了一条戴市场至华蓥山的公路，並帮助他组训武装力量。我们只吃饭，不拿工资，很快取得了他的信任。他视我为知己，一同办厂，一同组训武装，正当我们按周副主席的指示开展兵运工作时，郑启和这块小天地，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41年8月，蒋介石派出两个正规师和地方团练，以十万人马分两路包剿戴市场，並发出通缉令，悬赏万元捉拿郑启和。在这紧急关头，郑的不少老关系如杨沧白和但懋辛都劝郑撤离，但郑启和发誓要与他经营的根据地共存亡。不久，两军交战，郑的这点武装怎能抵挡得住呢？蒋介石的军队很快占领了戴市场，郑启和突围不成，壮烈自戕。这就是1941年发生的广安“河东事件”。

广安开辟工作的计划未能实现，我们的同志大部分突围，我和江济业突围未遂，被广安县保安队捕去，经组织营救才取保释放。

我从广安回重庆，周副主席在方家什字街《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楼上，单独听了我的详细汇报。周副主席听完后，指示我暂时避免与外界接触，另行安排工作。“青科技”一部分同志去延安或另行安排，我仍留重庆，参加沙磁区蜀都中学的筹建工作。

毛泽东主席来重庆谈判期间，在周恩来同志安排下，在红岩村接见了“青科技”的李文采、张哲民等成员，听取了汇报后指示我们：“要与工人密切联系，要开发矿产，江西

苏区时，就是靠钨沙来换食盐……”。

回顾 40 多年前的这段历史，我永远忘不了周副主席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与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斗争的光辉业绩。凡是聆听过他亲切教诲的人，都永远忘不了他那慈祥和蔼的面容和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敬爱的周副主席将永远活在我们亿万人民的心中。

终身难忘的教诲

张 仲 明

重庆私立蜀都中学，是在南方局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下，由沙磁区几位地下党员创办的。1944年12月初，周副主席曾亲自接见我们几位创办人，接见时给我们的教导使我终身难忘。

1944年12月，日寇侵占贵州独山，消息传来，陪都重庆人心惶惶。就在这个时刻，南方局青年工作组组长刘光通知我们几个蜀都中学的中共地下党员陈俊逸、姜瑄和我，还有沙磁区学运负责人孙稚礼，要我们到曾家岩50号去。

这天早晨有雾，寒气袭人，8点多钟，刘光同志已在求精中学的大操场边等我们。人到齐，刘光在前引路带我们进了曾家岩50号底层的救亡室坐下。这时才告诉我们说：周副主席要接见我们。我们听了十分激动，顿时感到室内温暖如春。刘光又说：周副主席正在同外国记者谈话，要我们稍候。不一会，刘光陪着周副主席走了进来，我们都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用尊敬的眼光望着周副主席。刘光将我们一一介绍，周副主席神采奕奕，用炯炯而又是慈祥的目光，随着介绍，一一注视着我们。叫我们坐下，他站着神情庄重地对我们说：日寇已侵占了独山，贵阳已紧急疏散。我们要作好准备，万一日寇进犯四川，不管蒋介石是否投降，我们中国共产党都要带领人民把抗战进行到最后胜利，必要时我们要

组织打游击，以自救救国。

接着他指示我们：你们蜀都中学已经办起来了，就要坚持办下去，把它办好。要用“抗大”的精神来办，要发扬革命求实精神，教学要课内外结合，把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和民主教育结合起来，把蜀都办成一个爱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堡垒。现在的任务，就是培养输送革命干部，必要时你们可以带着学生和老师上山打游击。四川的通、南、巴、酉、秀、黔、彭、华蓥山都是打游击的好地方，要把教育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蜀都既要办成输送革命干部的基地又要办成隐蔽和转移同志的一个“据点”。还要在教育战线，青年学生中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最后周副主席慈祥而又爱抚地说：听说你们办学很艰苦，创办人教书办事不拿工资，只吃饭，菜是青菜胡豆，洗脸在溪沟里，生活是艰苦，但这也是锻炼人嘛！我对同志们艰苦创业的精神，表示感谢！（大意）周副主席给我们讲了一个多钟头才结束，因为有客人等着他，我们几个人就由刘光领着座谈讨论。不久，我们还看到周副主席同几个外国人站在救亡室外的院坝里谈话、拍照。我们几个就在室内小声的议论着：“周副主席在国民党这个虎穴里的斗争，是多么艰巨，忙碌啊！”“他对我们办蜀都中学的重要指示，是多么及时，多么亲切，多么的激励人心啊！”随后议论转到“如果日寇从独山继续进犯，我们怎么办？”

“我们带领师生打游击，到那里去打？”大家认为“华蓥山在四川的中部，离重庆不远，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因此午饭后，我们又继续讨论华蓥山的一些具体情况以及我们学校如何作好准备等等。天快黑了，刘光用副主席的黑色轿车把我们三人（陈俊逸是从后门下河边走的）从大门送出去。

车经上清寺两路口很快转了一圈，然后向浮图关坡上开去，看到车后没有盯梢，到了半坡，车子停下，叫我们三人下车，赶快分头散去。天黑了，寒气袭人。但周副主席教导的声音，仍在我们耳中迴响，使人振奋，方向明确，信心倍增。

40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他老人家接见我们的情景，心情就很激动。观今宜鉴古，重温周副主席40年前的教诲，使我深深体会到：周副主席高瞻远瞩、深谋卓识地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正确地分析当时抗战的严峻形势，对胜利充满信心。教导我们，在国民党的陪都所在地，蜀都中学应办成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材；怎样把教育与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周副主席是执行党统战政策的典范，他十分重视团结知识份子和人才的培养。在国民党陪都重庆，在他的关怀下办了社会大学、育才学校、清华中学、莲华中学等一大批学校。还输送了不少知识青年去延安和中原解放区。周副主席在重庆，以身作则，运用党的统战政策，团结争取了各阶层的进步力量，特别重视对知识界的统战工作，非常强调发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对我们当前贯彻“十三大”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副主席在我们蜀都中学刚刚办起来，就十分关怀勉励我们要艰苦创业，要克服困难。他老人家在延安时就参加开荒纺纱。朱总司令在井冈山亲自挑粮上山。老一代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革命光荣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光大。我们就是遵照周副主席的教导，把蜀都办成了党的红色据点，为党的事业培育了一大批人才。我校校董周均时先生和中共沙磁区特支委员张国维、中共党员朱麟、滕久荣四位同志为革命事

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周副主席已经离开我们 12 年了，在他 90 诞辰之际，回忆他老人家 40 多年前给我的教导，是我终身受益的教导，是我终身难忘的教导。

眷 眷 慈 父 情

——记周恩来对红岩儿童的关怀

刘 英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在华夏大地，雾茫茫的嘉陵江边，矗立着一座葱浓苍郁的山峦——红岩。当年，那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所在地。那里既有紧张繁忙的工作，又洋溢着民主的气氛，充满着革命的朝气和共产主义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生长在红岩的孩子们，在那蓓蕾初开的年华就沐浴着温暖的光辉。红岩的孩子们自幼受到周副主席的关怀和爱抚，他们熟悉那可亲的笑容，亲昵地叫他“胡子爸爸”。“胡子爸爸”，在那些幼小的心灵里，成了最亲爱的人。在周副主席的关怀下，红岩这个充满了爱的革命大家庭，成了红岩孩子们幸福成长的乐园。

在当年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周副主席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却从未忽视儿童的教育。在1942年，随着办事处孩子的增多，对孩子的教育、管理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对此十分关注。在他们的亲自倡导下，红岩托儿所诞生了。

当托儿所办起之后，许多新的困难和矛盾出现了。托儿所的孩子多，玩具少，孩子们常争闹。周恩来同志得知后，亲自动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警卫班的战士齐动手来做玩具，孩子们都有玩具耍了。最初，托儿所的孩子由妈妈们轮

流照看，这样妈妈们也可以安心地工作了。可是，有一部分同志看不起托儿所的工作，认为是做些婆婆妈妈的事，因此在工作上马虎，不尽心。他对这些同志说：“在我们共产党内，儿童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革命的后代，是大家的。托儿所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它关系到革命前途和妇女的解放，以及共产主义事业的继续。我们应发扬阶级友爱和母爱精神，培养孩子们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使他们成为有远大理想的人，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后继者。”有一次，一个办事处的女同志因小孩拖累、家务繁重，工作效率低了而烦恼，认为结婚必然影响进步，所以主张不结婚，为此引起了一场争论。周恩来同志了解到这位女同志的烦恼和大家的争论后，语重心长地对同志们说：“哪个同志不结婚呢？结婚成家就必然要增加家务劳动量，处理不好，就要妨碍工作。”他希望这位女同志作好安排。周副主席的非凡说服力和一次次动情的教诲，使同志们认识到关心和教育儿童的重要性，摒弃了那种轻视托儿所工作的错误思想，尽心尽力地爱护和培育这些红色的幼苗。

周副主席不仅教导大家要关心孩子，而且他自己在关心孩子上作出了表率。他对红岩孩子们所表现出的爱，深深地感动和启发了办事处的同志们。

在红岩有个名叫“小火车”的孩子，是南方局许涤新同志的大儿子。因患了脊椎结核，只好穿着石膏背心整天躺在床上。周恩来与邓颖超同志十分关心这个病孩儿，他们常来到“小火车”的床前，深情地抚摸着孩子，问长问短，表现出百般的怜爱。还嘱咐“小火车”的妈妈，一定要耐心地照顾孩子。有一次，“小火车”日夜发烧，身体虚弱，需要服用